



关于坐火车的碎片化记忆

□黄文龙

十八岁前，我一直生活在贫瘠的西乡，没有机会走出来。我所在的这座江北小城，当时一寸铁轨也没有。童年的我，只是从书本和电影里知道铁路和火车。彼时，心里最朴素最朦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走出西乡，坐上火车。幼时的我，也经常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卷着双手充当喇叭，用西乡土语对着空旷的原野大声叫喊：“火车火车，什么时候来我家？”

机会终于来了！1986年10月，高中毕业的我应征入伍，辗转南京，从中央门火车站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，奔赴烟台某部新兵教导团。

时值秋末冬初，和煦的阳光透车窗柔柔地抚摸着我们的脸颊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坐火车。出于初次坐火车的拘谨和对带兵干部的莫名畏惧，同时也饱含着对未知前途的忧虑，大家一开始都是老老实实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连相互交头接耳的都很少。但时间一长，年轻人特有的好动好说的调皮劲就无遮拦地显露出来了，伴随着“咣当咣当”的车轨摩擦声，大家渐次开始三五成群地在一块叽咕喳喳，热情地交谈起来。

随着列车一路向北，天色渐渐暗淡下来，气温也不再温和，有了凉嗖嗖的感觉，特别是从徐州再往前走以后，一股肃杀清冷的景色随之而来，大伙儿心中的好奇度和热情也在慢慢消退，车厢里的气氛在经历短暂的热闹后也渐渐冷淡下来。

突然间，一声惊呼声传来，大家的心倏地一下绷紧了。“停车！快停车！我的帽子飞了！”原来，一位战友只顾探着脑袋在窗边看风景，军帽却被风刮走了。小插曲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，车厢里弥漫着的阴霾气息也一扫而空。

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连队生活后，我于1988年8月下旬离开了部队驻地，乘坐潍坊到合肥的火车，

到解放军合肥炮兵学院报到。

考上军校，而且是本科院校，别提我当时的那股高兴劲儿了。因为买的是无座票，我特意从连队带上了小马扎，看看能在哪里挤着坐一坐。可谁知，上了车后，我这个朴素的愿望落了空。车厢里到处挤满了人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有穿得体面的，也有农人打扮的。座位上满满的都是人，没有一个空位，过道里也挤得满满当当，人挨着人，甚至连座位底下也塞着人和行李。我背着行李，站在车厢连接处，却硬是找不到放小马扎的地方。大家都喘着粗气，争相抬高着嗓门讲话。不知是谁放出了连串的响屁，也是闻者从容，放者安然，毫无顾忌。

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们皆前胸贴着后背，无奈地挤在车厢里，没法挪动，甚至连上厕所的想法也根本无法实现。慢悠悠的火车几乎站站停，到站的旅客费劲地挤下车后，又立刻填满了空。没有人有闲情欣赏窗外的景色，每个人内心最渴望的就是火车赶紧到站，结束这趟非人之旅。

大约八个多小时后，我在安徽蚌埠车站下了车。在站前广场，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长长地呼出了一大口浊气。在广场边小吃店吃了一碗面条，稍事休息后又换乘上蚌埠到合肥的一趟慢车，去学校报到。

胡适说，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，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。可我无论干什么，却都不能忘记这两次乘坐火车的经历，无论何时何地想起都能让我记忆犹新，乃至刻骨铭心，因为这两次难忘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
自此之后，我乘坐火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，探亲休假、出差学习、参加军事演习等等，都坐过火车。渐渐地，乘坐火车于我来说不再是新鲜事，进

站、出站、过站等也不再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划痕。

本世纪初，小城也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，但因停靠的车次少，车站偏，小城人出行还是习惯于乘坐汽车。可没多久，火车单线改成了复线，而且在小城的停靠车次也增加了，政府专门筹资建设了新的火车站，小城居民也渐渐习惯了乘坐火车出行。想象着小城车站人头攒动和火车轮轨交磨的场景，我从心里为家乡的发展高兴，但却一直没有机会从小城车站乘坐火车出行。

直到两年前女儿到扬州上大学。一日，忽然有了去学校看看女儿的想法，就从网上购了票，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“旅行”。

整洁漂亮的火车站，干净利落的站台，没有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没有了商贩的叫卖声，火车几乎悄无声息地停靠在站台边。人们有序地登上火车，在宽敞的座位上坐下。车厢里整洁安静，环顾四周，衣着光鲜的人们安静地坐在座位上。有的在默默地看书，有的在摆弄着手机，有的在轻言细语地聊天。偶尔几个调皮的孩子在过道上窜来窜去，身后随即传来美艳少妇娇嗔的呵斥声。

再过两年，小城就要开通高铁了，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对小城人来说，也不再是梦想了。位于城南街道的高铁站已经动工建设，高铁新城建设也已初具雏形。假以时日，到上海吃个早餐再回小城上班、到北京吃个午饭再回小城来吃晚饭，对普通百姓来说，都将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

交通的大发展已成为小城镇社会发展的新引擎，为小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。在家门口坐火车不再是梦想了，如今坐火车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方便。这座江北小城，也因这风驰电掣的火车，幻化出一份异样的风采，增添了一种迷人的魅力。

红色周庄——美丽的传说

□朱广英

关于大圣寺的由来，今人已无法考证了。据说，大圣寺曾是一处净土法门的念佛道场且香火旺盛，有诗为证：如皋边隅西南乡，四十五里到贡家巷，大圣寺坐落于北方，每天有人来烧香。

据说在其鼎盛的时候，曾有殿堂、僧房数百间，僧众多达两百多人，为十方净土念佛道场。大圣寺僧人在念佛修行的同时，不忘爱国护教之举，爱国高僧僧俊如当年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，后被国民党逮捕壮烈牺牲。

一天下午，我到大圣寺参观，缅怀先烈。在那里我遇到了爱国高僧僧俊如的徒孙正江，听他讲述僧俊如的革命故事：僧俊如，1885年12月出生，1929年参加革命，中共党员，地下工作者。僧俊如当时是贡家巷大圣寺的住持，他利用其特殊身份——僧人，在庙里秘密开展地下工

站在咱家的锅台前，我凝视良久，记忆的闸门蓦然打开，锅台的故事陪我走过了七十年。

听母亲生前痛说，我出生的第二年，父亲原是新四军的北撤干部，后在原下原乡任地下党的指导员，1949年前，国民党军疯狂挣扎，从磨头据点常下乡扫荡。一天傍晚，母亲正在泥块垒起的锅台前准备煮晚饭，一群还乡团撞进家门，先用枪托子轰断门栓子，吼叫着向我母亲要人，问我父亲藏在哪儿？母亲虽目不识丁，但她知道父亲在外参加革命，是为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。在她宁死不说的情下，一个匪兵用枪拐子将我家缺边框的铁锅砸出了一条裂缝……日后，母亲每逢煮饭，都得用掺粉调成浆糊将锅子裂缝堵住，才能勉强煮熟饭粥。

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由于地方汉奸告密，父亲连同其他的手干部一同被抓起来。父亲等革命先辈宁死不屈，数经严刑拷打，被敌人用“灌肚肺”（即用火油灌肠胃）后，“呛虾”牺牲（把人推进烂泥浆中致死）。在朝不保夕的时日里，母亲拖着我和两个姐姐，过着基本揭不开锅的飘摇生活，原先锅盖用竹筛子加棉布做成，后在亲友的帮助下，用被敌人打断的木门栓子做了一个锅盖，一口铁锅请修锅匠加上几个补丁，勉强好用，只能用吹火筒（竹制的）吹火，用棕桐树叶当扇子扇火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我家的生活终于有了好转，

作。正江师父说，他的师爷僧俊如当年曾利用僧人的身份，到当地地主家里化缘，目的是为了摸清地主家里武器弹药的储藏地点，红军战士得到师爷的准确情报，潜入地主家里，夺取了地主的武器弹药。红十四军用革命的武装力量打倒反革命的地主武装，把恶霸地主家的财物和田地分给当地农民。

1930年，大圣寺收留了很多红军伤病员，被国民党发觉。师爷迅速将红军伤员转移到安全地点，国民党在大圣寺并没有发现庙里有藏匿共产党痕迹，愤怒之下命人一把大火将古刹大圣寺烧毁。国民党抓不到师爷的把柄，恼成怒更不肯轻易放走师爷。1932年4月，师爷在如皋县城无端被国民党逮捕，后壮烈牺牲。

咱家的锅台

□杨兆成

但是家中缺了顶梁柱，分的田无劳力耕种，猪、鸭都难养得起。补过疤的铁锅换了一口新锅，由于缺乏荤油熬煮，经常生烟。到了春荒时节，锅中常煮的是野菜等，生火的柴草靠姐姐外出拾捡。记得有一年除夕前夜，母亲欠了本庄一大户人家的二斤半猪肉，正准备放在锅中煮。那大户人家上门急要猪肉钱，家中实无办法，母亲只好将洗净的猪肉拱手还给了人家，我们家只过了一个“素年”。由于生活窘迫，锅台面貌未变，生活依旧穷困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当地政府的接济下，生活终于有了一些改变，锅台开始用砖头砌成，一间灶台变成了两间灶台，吹火筒换成了木制风箱，铁锅上锈迹慢慢变少。

到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生产队开起了集体食堂，家中的铁锅又开始生锈了，有时只能偷偷地在锅中炒点胡萝卜干，煮点河边的野菜和树叶帮助充饥……日历掀开到七十年代的初期，家中的生活又开始好转，铁锅的作用不断地

端午节思外婆

□张琳琳

外婆总体说来是幸福的。外婆的离去，冥冥中是注定的。2010年端午节前夕，外婆患上急性阑尾炎，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做个手术就能够康复了，可是她已经97岁高龄了啊。医院不敢做手术只能让外婆回家。在南京定居的表哥得知消息后赶回老家。到家后，外婆已经神智不是很清楚了。我看着躺在堂屋的外婆，再也没有以往的笑容了，不过她还能分得清她最疼爱的孙子回来了，毕竟表哥也是外婆一手带大的。我一直在外婆身边给她喂水喂食物，给她擦身，给她剪指甲，和她说话，她一直迷迷糊糊地回应我的话……但外婆还是没有能再留恋这个她生活了近百年的地方，在一个每年对她来说都十分忙碌的时节里，在我表哥的怀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我自那年起，再也吃不到外婆包的粽子了，再好的粽子也不如外婆包的香甜。我是在外婆浓浓的爱和粽香中长大的。外婆是包粽子的好手，粽子好看又结实，每

五一回乡，精于厨艺的大姐夫张罗了一桌乡村时鲜，把我的胃撑得没了一丝褶皱。临走时，大姐又在车后塞了一大堆时蔬干货。这个劳动节，没有慰问劳动人民，倒是“打劫”了不少劳动成果，惭愧！

回到家，一点点检阅战果。小花生，身材紧致，体量沉重；小赤豆，红的本分，长的低调，这些恐怕还是奶奶一辈人传下的种粮吧？一切还是儿时家乡的老品种，这是乡人对老味道的坚守。

拾掇到最后，一包翠绿的树叶兴奋了我的神经——榆叶！真真切切的“小面榆”！难为了我的老姐，还记得我这个爹儿时的嗜好。小心捧出这堆宝贝儿，轻轻摊在竹筛上，一阵榆叶的清新刹那间盈满小屋，让我一下子走进儿时竹树环绕的故园春色。

“姜家套子”是乡人对故园的俗称。故乡四周环水，人多地少，河汉交错、房屋勾连、道路回复，外乡人进村时常迷路，故称“套子”。“套子”就有套子的特色，封闭、传统是必然的；精致、勤俭是逼迫的。一个套子，地理环境限制了发展格局，要以有限的土地养活当时未加限制的人口，吃便成了第一难题。父母苦扒一年工分，年末分配也难糊饱6个子女的无底胃洞。没办法，春夏之交，青黄不接的季节，一切看上去有绿色的东西都要服务于吃这“第一要务”。于是，沟坎上的野菜，竹园里的嫩笋，枯树下的菌子……一切都成了盘中餐——味不重要，果腹就行。

渐渐地，在我们孩童目力可及、手能够到的地界，能吃的都已扫荡殆尽。“眼光光，胃慌慌，怎么办？这时大人就有大人的优势了。在他们眼睛的高度，在春天里最迟抽绿的榆树醒了。仰头望去，枝枝丫丫间，一片片指甲盖那么大的榆钱儿探出头来了！

大人总是很沉稳，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一刻。爬树的脚蹬检查好了，勾枝的竹叉扎起来了，装榆叶的围裙拿出来了……万事俱备，只欠干将，谁上？榆树枝高、干直、皮糙，“爬树有风险，溜树易蹭皮”，这对惯于爬树的农村伢儿来说也是一大考验。好在有“胃的召唤”，不必过多的战前动员，早有皮实的细姐开始摸索绳扣，溜溜溜地上了。我是么么儿，一向是重点保护对象，虽常安享其成，但此时也不闲着，围着树大呼小叫。这边，枝丫可踩脚；那边，叶子最密实……这大张的嘴，还会有意外收获：飘飘悠悠的嫩叶常常自投罗网，掉落嘴中，便忍不住嚼食起来，虽青涩，但吃下去却回味无穷，窃喜……

仰了一个上午的脖子，在采足了一布袋的榆叶后，姐弟几个便可以彻底放松下来——择梗，筛末，浸泡，冲洗，沥水，晾晒。趁着榆叶将干未干的湿气，赶紧上锅。按照一层榆叶撒一层玉米面儿的程序层层码好，再用竹筷在叶子间扒拉几个透气孔，就可以盖上锅盖蒸了。姐姐烧火的当儿，我们几个就把大人留种粮后拣下来的瘪子花生米儿炒沙，凉下了，用玻璃瓶滚碎。一待榆叶出锅，热气透出，撒上花生碎儿、葱末儿、酱汁儿、麻油，就可以大吃而特吃了。

因为是打来的“野食”，不占用口粮计划，父母便让我们放肆地海吃，这在饥馑年代，是多么难得的奢侈啊！但榆叶虽好吃，却不易消化。于是整个下午，姐弟几个便个个像孕妇一般，捧着肚子到处踟蹰，那是因为吃得太过饱，又不消化，实在坐不下来啊……

如今，社会安定，岁月清凉，新生代已不再有机饿的恐慌了。每天面对鱼肉荤腥，疲惫的胃已鼓动不起一次冲锋，但根植于味蕾的记忆，却让我们一次次回望故土，回味童年。岁月，已把儿时的苦难记忆，酿成了今日的乡愁美味！

发挥起来，锅中煮煮的不但是饭粥，还有荤菜下锅，生活的质量不断提升。

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进了我家的锅台，家中拉上了电灯，开始买了电饭煲，手推风箱换成了鼓风机，锅台上的香味开始飘上了家中的屋顶，厨房开启了新一轮革命，逐步赶上了时代的步伐。母亲有遗属补助拿了，两个姐姐的衣服也由粗棉布换成了“洋布”（卡其布、兰花布等），我也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，烈士子女上学不但免了学费，还有全额助学金拿。老式的锅台也开始武装起来，新砌的锅台用上了磁砖贴面，除了铁锅外，还购置了铝锅，整个厨房的面貌有了极大改观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家的锅台也进入了新时代，家中不但保留着旧式锅台，还安装了不锈钢制成的新锅台，装上了油烟机、排风扇，用水由井水改成了自来水，还安装了净水器，家中的锅子花样也翻了新，平底锅、电炒锅、蒸饭锅、不粘锅、电煎锅、压力锅、电磁炉……应有尽有。锅中的食品是荤素搭配，辅料也日新月异，煤气、管道燃气为燃料主力军，空气净化器、吸尘器是锅台的好伙伴。

祖国成立七十年了，我家的锅台也走过了七十年，我是我家锅台变迁的经历者和见证者。我家小小的锅台，演绎着社会的发展、民族的进步；油盐酱醋，调尽人间美味，锅碗瓢盆，奏响颂党乐曲。

年的端午节前夕，都会有好些人家请她去包粽子。外婆总是乐此不疲地四处奔波忙着包粽子。每次来我家包粽子，我都喜欢搬个板凳，坐在她身边目不转睛地看包粽子。外婆包粽子的模样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每逢端午节，我想外婆了就会买个粽子，一个人边吃边回味，我永远都不能抱着她，听她的笑声了……每每想到这些，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喷涌而出。

外婆离开的那一天正好是端午节，这可能也是让子孙后代永远都记住她吧！从那以后，每一个端午节的香甜味变成了苦涩味。今年端午节，我又一次来到外婆的墓前，放上随手采来的野花和几样外婆爱吃的东西，跪下来，用小毛巾一遍遍地擦拭着墓碑，一次次抚摸着墓碑上外婆微笑的照片，我的脸不知怎么的又湿了，说好了不哭的，可还是无法控制……

又到一年端午时，我的端午节和别人不一样，更多了一份厚重的回忆和思念。

师长和我

□肖海月

恩师离开一个年头了。365个日子在恍惚间滑过，失落总隐隐地搁浅在心头，笑声里也有丝丝的苦涩和无奈。打开封存记忆小屋里沉淀的往事，摊开恩师、师伯和我在一起的日子，犹如一副山水画，或清晰或模糊，或近又或远。

我的恩师，王邦惠（1939—2018），四川重庆人，南京师范大学学前系毕业，原如城幼教辅导员。我的师伯，徐尔昌（1935—2006），江苏如皋人，如皋中学高级语文教师，曾任如皋书协名誉主席。

恩师、师伯我们仨在专业上的交流要从1995年说起。那年4月，经过初选、海选，我进入南通市幼师基本功角逐赛。恩师、师伯坐在他们家客厅的沙发上，让我把参赛舞蹈跳给他们看。我咬紧牙，绷紧腿，使出浑身的解数直至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只有节奏没有韵味的表演让师伯先开了口，他幽默地说：“你这舞怎么跳得跟挑担子似的？舞蹈是用肢体表达情感，需要灵动感的！”为了让自己变得轻盈，恩师把本就不大的客厅里的椅子全部挪移，带我跳起了华尔兹。记不起踩了多少步，也记不清转了多少圈。恩师用手暗示我起、伏、走、转的感觉如今依旧曼妙，恩师和我犹如引擎和轮胎。我零距离感受着恩师才艺、人格的双重魅力。当我取得南通市幼师基本功全能比赛两个一等奖、两个二等奖、两个三等奖的佳绩时，恩师、师伯为我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。虽然喝的只是雪碧，肚子里装下的却是满满的花团……

2018年3月25日，74岁的台湾老人陈彼得抱着吉他站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《经典咏流传》的大舞台上，用粗砺、沧桑、豪放的嗓音歌唱《青玉案·元夕》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我的师伯。走到书房，师伯为我题的书画作品——《青玉案·元夕》静静地立着。我走近它，抚摸它，泪不知何时滴落在面颊。为了三幅书画作品，恩师、师伯来过我的住处两次。第一次是测尺寸，以便书画尺寸跟安放书画墙面尺寸匹配；第二次是把装裱好的作品送达。每次来，恩师、师伯都是叫的人力三轮车；每次来，二人都是费力地爬上五楼；每次到达五楼的时候，师伯得坐在沙发上缓上半天，有一次坚持不得，还用了随身带着的哮喘药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陈彼得老人在嘶吼，而我也似顿觉：悲喜总是游弋在世俗的游戏里，繁华落尽是荒凉。恩师、师伯赠我这首婉约词，当时就有他们的一片良苦用心。时隔23年，我才大悟！恩师，师伯，对不起，你们的弟子我总是这么的迟鈍！

恩师家的座机号码码恰巧是由区号+恩师出生年的数字组成的，所以打师傅家的座机号码我一直都是盲打。恩师先前用过的手机号码，我一直保留着那一串数字字符。每当我遇到烦心事，想找人倾诉的时候，我总是下意识去看一下那个号码，但没有敢拨通过，看一眼心也就安了。我总是期盼黑暗里有盏油灯，抑或在天际有一颗星星为我导航，在我归来时，恩师、师伯为我牵过蹉跎劳顿的马，再为我轻轻拂去一路的风尘……

执笔沾墨静止在空中，踟蹰而行的我不知如何说明白想说的。凝望灯盏，恩师、师伯慈眉目善、安详地坐在烛光中。